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

本卷主编 陈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

本卷主编 陈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伊沛霞, 姚平, 陈致
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25-6096-7

I. ①当… ②上… II. ①伊… ②姚… ③陈… III. ①汉
学—研究—世界—文集 ②中国历史; 上古史—文集
IV. ①K207.8-53 ②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729 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上古史卷

陈致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400,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096-7

K·1439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系列由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China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赞助

总序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姚 平 译

1966 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 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 1966 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 19 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 (James Legge)、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卫德明 (Helmut Wilhelm)、威利 (Arthur Waley)、高本汉 (Bernard Karlgren) 等。此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 年贺凯 (Charles Hucker) 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

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957年)及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 1959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 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1949年后留在美国的,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

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倬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 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 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 70 年代，大学各系多已

①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

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 80 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 80 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 60 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 1962 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80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化大量的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梅隆[Mellon]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1951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以后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受

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①,从而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70年代的十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②(*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年)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1982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28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加大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化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

① 这两个组织在80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② 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60 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 90 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China political scientist)或“日本经济学家”(Japan economist)。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在系里低人一等。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 9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四十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 1969—1970 年期间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还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 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

目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标识(identities)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local perspectives)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国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前言

陈 致

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勇教授、学苑出版社的郭强先生和我在创办《诸子学刊》时,方教授与郭先生要我写一篇发刊词。我在发刊词中说到:

尔来山川有鼎彝之献,原壤蕴简帛之藏。老聃、辛文之典,历百劫得重光,孙武、孙臆之法,阅千祀而复出;是皆书传所纪,文献具存,而以此证彼,流传改窜之迹,斑斑可稽。他有书传存目,而文献略存者,曰《鹖冠》、曰《尸佼》、曰《尉繚》,真伪醇疵,历历可考。又有书传有作者之名,而文献无存者,曰《容成》、曰《申徒》、曰《子羔》,庶可补史之阙文。复有并书传亦无闻者,曰《五行》、曰《语丛》、曰《道原》、曰《日书》……,他如《春秋事语》、《纵横家书》、《三郤》《两棠》之记,《子玉》《叔伯》之文,洵古雅之别传,殆层出而无尽。是子学之七涅八涅乎?

而况象胥语文,沟通世界;诸子百氏,周流寰宇。Graham、Knoblock之译文,富赡可参;武内(义雄)、铃木(由次郎)之研究,精采时见,学问殆成天下之公器,不惟中土之绝学。昔海宁王静安先生正告天下云: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复谓求事物之原因,定其理法,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明其因果,谓之史学;出入二者,玩物适情,谓之文学。子学之法,莫外乎是。

故为学之道,宁若蚕缚。以知识之无涯,何畛域之预设!①

这篇发刊词虽然是就子学而言,但王国维的话实际上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领域:“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求事物之原因,定其理法,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明其因果,谓之史学;出入二者,玩物适情,谓之文学。”学术之研究,从大处而言,不外乎此三种视角与方法。西方汉学的早期中国研究实际上也不外乎这几种方法和视角。由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不惜力,地不藏金,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为我们带来了早期中国研究的学术上的空前繁荣。不仅中国的学术界如此,西方汉学界也一样。

承蒙伊沛霞(Paritritia Ebrey)教授与姚平教授抬爱,以及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的推荐,邀请我担任《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的主编。刚刚接到邀请时,我实际上略有些迟疑。主要的原因就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汉学界的早期中国研究,其成果和范围用一部专著来介绍可能还可以,如欲选十来篇文章来概括,那是绝无可能的,所以当时觉得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

实际上这里所收的十二篇文章远远不能代表近二十年来西方早期中国研究的成就,以本书所限定篇幅,也无法十分精要地反映出西方近年来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的研究成绩,在承担这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我心中所考虑的是选择一些在学术视角和方法上与我们中国学者差异比较大的论文,对中国学者来说应该是更有意义,更富于启发性和参考价值。十二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也许很多中国学者不能接受,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我们中国学者不曾提出过,或未曾特别留意和充分重视过的。这些文章由我从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选取出来,是我认为比较有

① 陈致,《发刊词》,《诸子学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

特点的论文。选定之后,我写信给每一位作者,征得他们的同意。承蒙这些学者的大力支持,此书才得以问世,几位早已荣休的学者,如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鲁惟一(Michael Loewe)、蒲立本(Edward G. Pulleyblank)皆已耄耋之年,仍支持此书的结纂,有的还亲自审定译稿,令我十分感佩。

所收的文章中,第一篇是西方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的大家吉德炜教授的一篇力作。此文的特异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察,得出一个迥异于中国甲骨文和殷商史学者的结论。本文认为先商时代以及商代的先公先王的庙号是晚商时期的统治者基于现实的需要而构想的。这一论断对于中国古史学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史记·殷本纪》中明白记载着这些庙号,而且这些庙号由王国维发现在甲骨文中大体得到应证。然而,吉德炜教授却通过甲骨文中的例证试图证明在晚商第二十三任君主——祖甲的统治下(约公元前1177—1158年),祭祀系统变得规范化。他指出:“为了带来更好的秩序,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为此他尝试借助于祖先的力量和促成王室家族成员的团结一致。正如我们所见,君主及卜祝现在将祖先和其命名的日子严格地联系起来。在卜祝把五个祭典周期规范化后,每一位先祖及先妣因而都可以各得其所,而每位祭师都知道他和她的位置。相应地,人们不会再浪费任何时间在决定奉祭的正确日子上,无论是对活着的或是死去的来说,也不再有更多的空间给予个人以人格的特质(personal idiosyncrasy)。”他进一步提出,先祖与先妣之所以有固定化的命名方式,如以家族称谓或者描述性词作为词首,而以天干作为词尾,这种规范化的命名使殷商的卜祝能够将祖先庙宇的名字和提供祭祀的日子清楚地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

殷商的君主认为向死者(无论是王室或是非王室的)授予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批准他的请求,并对反对他的人施行惩罚。这里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服务于在生君主的强制性警察。除了他们的地位,盘庚并没有被点名,其他的先王先公也是如此。虽

然这些死者有法律上的权力,但是他们却没有个人的人格。这可能是不被注意的,就像我们并不知道盘庚的外形或者个人的特质,他完全是作为一位法律上的形象表现出来,并发出命令。

在此基础上,吉德炜又将中国早期祭祀文化与西方文明作横向的比较,指出:

无论是在神学或是艺术上,殷商并没有将他们的祖先人格化。而且对于非形象化的喜好有重要的文化后果,在周代及其后的时间里,中国人的选择:例如在墓地或是祠庙都没有真人大小站立、自然主义式地(假如不是个人主义的)被展示的死者,而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世界里有多达数以万计的模拟真人的男子站立雕像(kouroi)树立,它们面上都带着那难测的“古风式微笑”(Archaic smile),将卷曲的毛发(public hair)加入绘画之中;或者不会在钱币上以人的头像或他们统治者的画像作修饰。这些都提升及加强早期那种非个性化、非表现主义的文化倾向。早期中国人对于死者的展示以及他们对于非个人的、非自然主义式秩序和阶级制度的强调都是非常不同于其他的。……在周代的文献中,对于英雄和杰出的人物也经常以这种较为刻板的方式来描述,正符合于对死者非人格化的处理。通过这样介绍的方式挑选出那些具有延续社会重要性和相关范畴的伟大人物,强调他们的权力和成就多于他们的人格,强调他们做过什么,而不是他们是谁。

吉德炜教授精研甲骨文与殷商史数十年,其所著《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一书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学界学习殷商史和甲骨文的入门书和工具书。吉教授又是西方最重要的研究早期中国的杂志《早期中国》(*Early China*)的创始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虽

然迥异于我们既有的观念,但也绝非无根之谈。关于商王的庙号,甲骨学者向有生日说和死日说之辩。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商王死后由占卜选日来决定,谓之选日说^①。这是甲骨文与殷商史学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假说,认为商王的庙号实际上与王位继承制有关。庙号的天干代表在子姓王族中与王位有关的被分为十个天干群的政治集团。王位的继承不能在同一天干群中传递^②。吉德炜此文可谓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别立新说,其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立论与研究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篇文章是夏含夷教授的力作《〈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一文。夏含夷教授一直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不像一般近代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宋代以后的伪作,相反,此书中至少一段四十字出自一条竹简,应该是与西晋武帝泰康元年(公元280年)汲冢出土的基本《竹书纪年》一脉相传的,基本上是汲冢出土基本的整理本。但该整理本和汲冢《竹书纪年》又有所分别,主要是:第一,把成王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误植入武王时期,从而将武王的卒年推迟了三年;第二,即造出了周穆王在周人立国百年时即位的传说。这篇文章是作者就此问题的进一步论述,主要针对穆王于周立国百年即位一说,力求去伪存真。作者在西周史料和年代学方面有多部著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其《西周史料》(*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一书与许倬云教授与林嘉琳教授(Katharyn Linduff)的《西周史》(*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可以说是西方汉学界中过去数十年来关于西周史料与西周考古方面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关于西周年代学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方面,夏教授曾撰有多篇文章讨

① 李学勤,《论殷代的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11期。

② 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及《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1983),第165—227页。其英文论述见于 Kwang-chih Chang, "T'ien kan: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天干:理解商史的关键》), in David T. Roy and Tsuen-hsuei Tsien eds.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42。